



《学点历史》丛书

列宁是怎样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的

列宁是怎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3
一、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建无产阶级专政	6
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13
三、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9
四、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30
五、贯彻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防止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39
六、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而斗争	49
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58
八、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	65
出版说明	75
编写者的话	75

列宁语录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

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是怎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列宁说：“**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下同)第 3 卷第 255 页）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写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新社会的更高的阶段。**”（《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 页）

后来，列宁又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至于共产主义，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41 页）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93—94 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唯一的一个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清楚地指出：“**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

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下同)第 3 卷第 21 页)列宁后来在引述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时接着指出：“**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317 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中还指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0 页)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苏修叛徒集团蓄意篡改这个基本原理，恰恰暴露了他们一伙的叛徒嘴脸。

社会主义社会“**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被推翻但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企图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工人阶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相互勾结，从各个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更残酷，而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围绕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84 页)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苏维埃人民为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革命不断引向深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苏维埃政权迅速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在斗争中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日益完善。

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他们进行了猖狂反扑，妄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苏维埃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的白匪叛乱。新生的红色政权站稳了脚跟，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

列宁认为，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反抗，这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不断铲除资产阶级存在和再生的土壤，则是更为重大、更为困难的任务。列宁深刻总结了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先后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伟大的创举》、《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概括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无产阶级“**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明确指出：“**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同上书第94页）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无论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分配制度等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革命，创造着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向着逐步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

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依靠什么力量呢？列宁说：“**依靠人民群众。**”（《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5页）列宁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巨大作用，保证了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十月革命后的六年多时间里，列宁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基础上加强了团结和统一。这样就保证了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胜利前进。

总之，列宁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建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非常尖锐。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俄国同英、法结成协约国，和德、奥同盟国进行战争。俄国国内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国广大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种形势下，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在党的会议上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为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路线。

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列宁再一次教导全党：无产阶级必须运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在这本书中，列宁又强调指出，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时，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列宁总结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经验，严密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

自己的革命任务。**“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列宁选集》第 271 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谈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同上书，第 307 页)在俄国，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是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列宁的这些指示，为即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八月上旬，在临时政府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彼得格勒，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未能出席大会。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分析了国内形势，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任务。大会通过了实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十月底，又成立了准备和领导起义的公开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夜间，俄国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七日深夜，攻占临时政府的巢穴冬宫，标志着伟大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十一月十五日，莫斯科武装起义也取得了胜利。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到一九一八年二、三月间，社会主义革命向全国发展，经过武装斗争，各地都先后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所以，列宁称这是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十一月七日夜晩，正当进攻冬宫的战斗激烈进行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正式宣告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陆海军、外交、财政、司法、内务等十三个人民委员部。各委员部的主席叫做人民委员。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光荣诞生。会上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停战，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大会一致通过了《土地法令》，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

国有，分配给劳动农民使用。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柱——资产阶级常备军还没有彻底解决。失败的俄国资产阶级总是凭借他们的力量进行拚死的反抗，无产阶级在捍卫苏维埃的战斗中逐步解除反革命武装，巩固自己的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临时政府头子克伦斯基勾结沙皇军队的将军克拉斯诺夫，①蒙骗一些士兵向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进攻。社会革命党②从内部策应，打起“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也在彼得格勒组织士官生叛乱，妄想置苏维埃于死地。列宁在紧急召开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号召布尔什维克党员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镇压反革命军队。列宁亲自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水兵，很快就把这股反革命势力镇压了下去，活捉了克拉斯诺夫，克伦斯基男扮女装狼狈逃窜。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苏维埃国家还处在同德、奥交战的状态，在前线的俄国资产阶级军队还没有完全瓦解。军队“总司令”杜鹤宁在英、法的唆使下，拒绝执行苏维埃政府责成他根据《和平法令》立即和德军指挥部进行停战谈判的指令，企图进行叛乱。列宁断然宣布撤销杜鹤宁的职务，并号召革命士兵起来造他的反。当杜鹤宁发动叛乱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将他们镇压下去。杜鹤宁本人也被起义的士兵打死了。从此，前线部队的领导权也掌握在苏维埃政府手中。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旧军队逐渐复员的法令，并设立陆海军复员专门委员部。苏维埃政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把临时政府的反革命军队消灭了。

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在摧毁旧军队的过程中，就着手建立一支工农常备武装力量。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仔细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指出，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这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重申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他在《四月提纲》里说道，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要“**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反

复辟斗争的新鲜经验，强调“**一定要建立一支常备武装工农红军，才能有效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列宁在谈到成立红军的意义时说：“**在世界斗争史中，破天荒第一次由没有官场习气的，而以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的人组成了军队。当我们所开始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426页）必须建立一支工农常备武装力量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决定。在彼得格勒很快就建立了第一支红军，他们都是由优秀的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组成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十四日，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由列宁签署的关于成立工农红军和红海军的命令，号召十八岁以上的公民踊跃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迅速壮大起来，不久就发展到三百万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支柱。

临时政府统治时期，沙皇的警察宪兵机关和法院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宣布废除旧警察、旧法院，建立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苏维埃政府发布命令，取消临时政府的民警，成立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苏维埃民警。又于十二月七日命令解散旧法院，并成立了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根据列宁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这个组织在惩治反革命分子，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衔制度和等级制度；实行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实行教育改革；实行男女平等。无产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苏维埃政府宣布俄国国内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废除民族压迫和宗教特权。

列宁亲自创建的苏维埃这个新型的国家机构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列宁十分重视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在成立人民委员会时，

各人民委员部是依靠广大群众建立的。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是由钢铁厂工人参加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水兵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组织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内务人民委员部是由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组成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是由各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代表建立的，过去的修理皮鞋工人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主任。列宁还规定国家各级机关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相继建立了国家监察、国家救济等办事机构。十二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罢免权法令草案》，宣布人民有权随时撤换违背人民利益，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职人员。根据列宁的提议，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工农检察院这个群众性的监督机构。苏维埃政府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使苏维埃政权牢牢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并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工农红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按照列宁的建军思想建设起来的。它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内部的士兵委员会和苏维埃行使日常的权力。它取消旧军队的军衔等级制度，实行上下一致，官兵平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列宁签署《关于全体军人权利平等》的指令，规定一律废除军队中从士兵到将军的军衔，取消各种勋章和奖章。一九一九年一月，苏维埃政府规定红军的各兵种和军种佩带领章和袖章以示区别，不设军衔制。军队指挥人员实行选举制，否定了旧军队内部实行严酷教练，严刑拷打等恶劣的军阀作风。

列宁创建的红军和旧军队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来自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戴。在列宁一九一八年一月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有一位老太太兴奋地向大家说，现在的军队(指红军)，虽然带着枪，可是不用再害怕这些带枪的人了。她深有体会地说，有一次，我在山里砍柴，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人，这个当兵的不但没有抢走我的柴草，而且用非常和蔼的态度帮助我干活，给我砍了好多干柴。这个故事生动地描绘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军民是一家人，军爱民，民拥军，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日子里，许多人家都争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当兵，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子弟走

上了保卫祖国的最前线。这支工农武装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列宁在讲到苏维埃政权之所以是一个新型的国家机构时指出：因为“**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同人民隔离，而是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308页）在建立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过程中，充满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发动武装进攻、杜鹤宁实行军事叛乱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③公然叫嚷要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并以他们所把持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称举行铁路罢工，对苏维埃政府施加压力。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工贼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也跟着反对苏维埃政权。当时窃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加米涅夫，利用同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的机会，竟同意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要列宁辞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社会革命党人担任。列宁坚决地回击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挑衅，严厉地谴责了加米涅夫之流的叛徒行径，指出：“**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决不当有别的政府。**”（《列宁选集》第3卷第369页）“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是公认的苏维埃政府。”（同上书第370页）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提议，撤销了加米涅夫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任命斯维尔德洛夫来担任。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利用他们所把持的立宪会议，打起召开立宪会议的旗号，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来对抗“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教育和争取群众，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上的斗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起草了《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要求立宪会议宣布俄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立宪会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开幕。会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遭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疯狂攻

击，他们顽固地坚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主张。当立宪会议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逮捕了反动头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一九一八年一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这是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几百名代表共聚一堂，商量国家大事。许多民族地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列宁选集》第3卷第404页）《宣言》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纲领，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确认了苏维埃政府自十月革命以来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把刚刚创建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巩固了下来，捍卫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成果。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组织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伟大导师列宁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新式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袋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列宁选集》第3卷第428页）列宁在大会闭幕词中谈到这次会议对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时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规划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9页）

①金名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发动武装进攻，失败后被俘，后表示悔罪而获释。一九一八年，又在顿河地区发起叛乱，在察里津附近被击败。以后潜逃国外，当了德国法西斯的奸细，被俘后于一九四七等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绞刑。

②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一九〇二年。早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成为反革命政党。他们中间曾分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不久也走上反革命道路。

③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派别。一九〇三年，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它一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向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猛扑过来，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掌握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反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任务。

一九一八年初，阶级敌人的活动很猖狂。在农村，地主、富农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杀人放火，囤积粮食，制造饥荒，无所不用其极。在城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行煽动，捣毁机器，消极怠工，破坏生产。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谋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列宁到米海洛夫斯基练马场去作报告。当列宁发表演说乘车离开会场时，反革命暴徒竟向列宁开枪射击。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在阶级斗争极其残酷的岁月里，肃反委员会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无情地镇压了阶级敌人的反抗，捍卫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帝国主义进攻的严重威胁。苏维埃俄国还处在同德、奥战争状态。在这种条件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巩固的。为了稳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列宁认为：“**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使社会主义政府完全可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410页）赢得时间，加强战备，“**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同上书第413页）列宁指出，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结束战争，就可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巩固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

苏维埃政府发出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遭到英、法等协约国的反对。它们妄图借德帝国主义之手，一举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毅然决定与德国单独媾和。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开始谈判。会上，苏维埃代表团宣读了《和平法令》，主张双方缔结平等的和约。可是，德国代表别有用心，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竟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俄国放弃德军占领的全部俄国领土，并付给三十亿卢布的赔款。列宁决定实行必要的妥协，同德国签订和约。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叛徒托洛茨基、布哈林公然违抗列宁的指示，使谈判中断，给德帝国主义发动武装进攻造成可乘之机。二月十八日，德帝国主义的军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发动进攻，侵占了大片俄国领土，逼近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二月二十一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选集》第3卷第437页）号召俄国工农大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并指示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严格监督，对奸细、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在城市的街头、机关、工厂到处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共产党员同志！你会使用武器吗？你受过训练吗？……你应该准备好全副武装去捍卫社会主义事业！”莫斯科青年组织发出号召：“大家起来保卫革命！青年绝不会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青年无产阶级，拿起武器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列宁的号召，纷纷参军，开赴前线，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而战。一九一八年二月下旬，年轻的苏维埃军队在彼得格勒西南的纳尔瓦和普斯科夫，给德军沉重打击。为了纪念这一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将二月二十三日定为红军建军节。德军进攻被击退后，才被迫同意恢复谈判。三月三日，德国和苏维埃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为苏维埃俄国赢得了时间，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强战备，迎击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列宁抓住这短暂的空隙时间，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①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

作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示开展劳动竞赛，实行经济核算，严格劳动纪律，对产品分配实行计划监督。但是，建设苏维埃经济的计划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打断了。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英、法、日、美等协约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革命成果不断扩大恐惧不安。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复辟沙皇专制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3页）当时英国的陆军和空军大臣丘吉尔公开叫嚣要组织干涉军，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反苏的口号下，国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起来，策动反革命武装进攻。

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英、法、美干涉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后又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那里支持白匪叛乱，推翻了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社会革命党的自卫政府。同时，日、英、美军队陆续在海参崴登陆，在苏俄远东地区组织了反革命政府。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国俘获的五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战俘，被允许经西伯利亚到法国去。他们在遣返的路上，受到英、法的支持发动叛乱，在萨马拉成立了“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白卫政府。

得到帝国主义援助的国内反革命武装，也在许多地区发动叛乱。沙俄军官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占据着俄国大块土地。在首都莫斯科，^②社会革命党徒闯进德国大使馆，刺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妄图挑动德帝国主义向苏维埃进攻；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叛徒、“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社会革命党中央指使亡命徒卡普兰，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乘列宁在米赫里逊工厂发表演说离开会场时，用上了毒药的枪弹向列宁射击，使列宁两处受伤。他们妄图用谋杀伟大领袖的卑劣手段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在反苏的喧嚣声中，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也赤膊上阵，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抛出了一株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

苏维埃政权。考茨基的这番表演，正如列宁说的，他“象‘小公鸡’那样跟着资产阶级跑”，（《列宁选集》第3卷第687页）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组织反革命暴乱制造舆论。

为了回击修正主义分子对无产阶级的污蔑和诽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间，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谬论。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同上书第640页）因此，为了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抗，就必须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镇压。列宁说：“**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同上书第517页）

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了迅速的无情的镇压。一九一八年秋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转入战时轨道，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府宣布处决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把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合并起来，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为了加强国防建设，设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开展了普遍军训，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把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在红军中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列宁“一切为了前线”的战斗号召下，几十万工人、农民加入了红军。当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党、团员带头参军，保卫祖国。工农红军与帝国主义侵略军和国内白卫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察里津（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后被苏修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被自卫军四面包围，情况危急。根据列宁的提议，斯大林同志被派到察里津，组织察里津保卫战。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年轻的红军英勇奋战；工厂夜以继日的制造枪炮；全市总动员支援前线。列宁致电察里津的英雄们：“**高举红旗，擎着它们无畏地前进，无情地根除反革命地主、将军和富农们，让全世界看看：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是不可战**

胜的。”(转引自《苏联历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1950年1月中文版第246页)察里津的军民团结奋战，终于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进攻，保卫了察里津。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的失败而告终。苏维埃政府马上宣布废止布列斯特和约，并命令红军收回被德军占领的国土，把德国强盗驱逐出境。德、奥失败后，协约国立即纠集了十四国反动武装，配合国内白卫军，向苏维埃俄国发动全面进攻，英法把军舰开进了黑海，派军队在敖德萨和南高加索一带登陆。在短短两年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一九一九年三月，它们发动了第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是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白卫军为主的。高尔察克的四十万军队是靠英、法、日、美的武器装备的。它们在长达二千公里的东方战线上发动进攻，很快越过乌拉尔，侵入伏尔加河区域，占领了三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协约国把复辟希望寄托在高尔察克身上，宣布他为“俄国最高执政者”。同时，在北高加索的邓尼金，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等反动武装，也配合高尔察克，发动了攻势。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列宁号召工农群众：“**必须用全力粉碎高尔察克**”。(《列宁全集》第29卷第246页)大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奔赴东方战线。从四月到七月，东方战线增加了十一万名新战士，战斗力大大增强。在阿斯特拉罕的保卫战中，苏维埃红军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四处逃窜。

正当东方战线节节胜利时，窃据军队领导职务的托洛茨基竟下令停止追击，要把东线军队调到南线。这个计划是让敌人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帮国内外敌人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叛卖计划。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识破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命令红军乘胜前进。在伏龙芝和古比雪夫的指挥下，红军从一九一九年四月开始反攻，八月解放了乌拉尔，到年底，高尔察克的军队被完全消灭，活捉了高尔察克，并将其处死。东方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的进攻也被击退。第一次武装进攻被粉碎了。

协约国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把赌注押在南方的反动势力头子邓尼金身上。一九一九年秋，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美国武装了十万人的邓尼金反动军队，英国派了二千名军事顾

问，配合邓尼金从南向北进攻。十月初，由于托洛茨基的罪恶活动，致使红军接二连三地受挫，白卫军侵占了乌克兰，逼近莫斯科的西南门户、军事工业重地图拉城。在这危急的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列宁发出的“**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23页）的号召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支援前线运动。当时，有二十万名先进工人、农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充分体现了革命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为了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党中央撤销了托洛茨基在南方战线的领导职务，派斯大林担任南方战线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在斯大林指挥下，红军在哈尔科夫——顿里斯——罗斯托夫一线发起反攻，到一九二〇年初，就解放了乌克兰和高加索。邓尼金的军队被击溃。与此同时，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二次进攻也被粉碎了。英国入侵波罗的海的海军也被驱逐出苏维埃俄国的领海。协约国第二次武装干涉又告惨败。

粉碎邓尼金之后，苏维埃共和国获得了三个月的喘息时间。不久协约国又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进攻。一九二〇年四月，协约国指使波兰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武装闯入乌克兰境内，占领了基辅和第聂伯河东岸地区。同时，白匪头子弗兰格尔从克里木半岛向北发起进攻。经过战斗考验的红军越战越强。六月，就开始全线反攻，把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武装赶出国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苏维埃红军在伏龙芝指挥下，挺进克里木半岛，粉碎了弗兰格尔军队，取得了粉碎协约国第三次武装干涉的胜利，至此，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基本结束。

在远东地区，战斗还延续了一个时期，直到一九二二年十月，红军才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国土。

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用反革命武装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活动遭到了失败。红军粉碎了三次武装进攻，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在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了。在保卫十月革命的斗争中，苏联境内各族人民的团结大大加强。他们迫切要求成立多民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据列宁的建议，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宣告成立。

①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通过决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②一九一八年三月,苏维埃俄国的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三、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俄国无产阶级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剥夺剥夺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500页)大规模地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引起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疯狂反抗。在经济战线上,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十分激烈。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天里,苏维埃政府立即把过去由沙皇政府控制的工矿企业和国家银行收归国有。在革命前,全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铁路属于国家所有,革命后,它们也就成了苏维埃国家的财产。这些是苏维埃俄国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对于所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工业、商业、银行、农业和运输等企业,列宁主张实行工人监督。当时他就写道:“**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末,……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列宁选集》第3卷第396页)

列宁曾经设想:对私人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以便工人有机会学习管理工业和治理国家的本领,进而过渡到工人管理,即收归国有。所以,列宁说,工人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指示制定的《工人监督条例》。规定由企业工人成立监督委员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分配实行工人监督。企业主必须服从由工人和职员中选出的代表的领导。各省市都建立相应的工人监督委员会实行领导,在全俄范围内,由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统一领导。

同时，为了打击商业中的资本主义势力，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草案》。法令规定，商业资本家应无一例外参加消费合作社；在商品交换中，所得的金钱全部记入所有者在当地人民银行的往来账上，不得任意提取现款，防止他们搞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供应。这样一来，既可防止商业资本家牟取高额利润，又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

资产阶级预感到末日的来临，拚死地反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他们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串通一气，又取得国际资本的划拒绝服从工人监督。他们有的在工人实行监督的地方，企图强行关闭企业，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职员停工，举行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总罢工。英、法资本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政府的大官僚斯塔任涅茨基则到处活动，明目张胆地组织罢工委员会，反抗苏维埃政府。有的直接破坏生产，捣毁机器和设备。例如，斯米尔诺夫利金纺织厂的企业主进行怠工，大肆损坏机器了准顿涅茨煤矿的克里沃罗格矿区，反动资本家放水淹了所有矿井的各个巷道，使这个矿区在短时期内根本无法生产。也有的消极怠工，阻挠发展生产。象正在兴建中的梁布辛斯基汽车工厂的董事们，一再拖延建筑工程，迟迟不交工。不少资本家利用职权提走企业的现金储备，有一个大联合企业只剩下五百四十八个卢布的资金。

一些商业资本家拒不参加消费合作社。银行资本家更加穷凶极恶，他们狂妄地叫嚣要用卢布来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把银行金柜的钥匙拿走，拒绝拨款给实行工人监督的企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粮食机构，竟宣布不再供给首都彼得格勒粮食。工程师协会开除服从工人监督的会员。邮电部门的老板肆无忌惮地扣压政府的一切法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资产阶级唱着一个腔调，使劲地攻击工人监督制，胡说实行工人监督是不合适的，什么打击面太宽了，造成国内紧张形势等等，企图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在那些不实行工人监督的企业中继续存在下去，以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资产阶级还到处煽阴风：“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破坏所造成的地狱。”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抱定的目的只有一个：破坏苏维埃政权**”，**“就是希望剥削者的旧日天堂、劳动人民的旧日地狱再回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69页）他又指出：“**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选集》第3卷第390—391页）列宁指示全国：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他在给哈尔科夫的安东诺夫司令部人民委员弗·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中表示特别赞成：“**逮捕……腰缠万贯的怠工分子。建议把他们押到矿区，强迫劳动生产。**”（《列宁全集》第36卷第477页）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群众性的保卫红色政权、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革命运动。

苏维埃政权在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逮捕了危害人民事业的反动资本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没收了他们的企业，由工人来管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成立了苏维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性的机构。它领导着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领域内对剥削阶级作斗争。它有权对企业采取一切措施，包括扣押、征用、没收和实行国有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加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发展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

苏维埃政府着手彻底贯彻和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剥夺者的剥夺，“**将所有的工厂、铁路、银行、船只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0页）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苏维埃政府就颁布了关于工业企业国有化的第一个法令，由政府委派代表到私人企业，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实行领导，改变了这些企业的性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利金纺织厂第一个实行国有。随后波戈斯洛夫矿区股份公司因拒绝实行工人监督而被没收。同时宣布收归国有的还有：西蒙斯基矿厂股份公司、克什提姆矿区股份公司、普梯洛夫工厂、塞

尔金—乌法莱矿区股份公司、阿纳特拉飞机工厂等。苏维埃政府根据一九一八年一月九日的法令，把总值达 20 亿金卢布的全部外国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制糖业和石油工业也收归国有了。由于工矿企业的国有化顺利地进行着，到一九一八年六月，全国已有一千五百五十三个工矿企业收归国有。一九二〇年底，国有化企业已经有四千五百多个。至此，全俄只有很小规模的手工业企业没有实行国有化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底，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法令宣布全国的银行由国家垄断；所有私人银行同国家银行合并；全俄成立统一的人民银行。银行业国有化的法令颁布后，彼得格勒的工人赤卫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编为射手队，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天里，就向首都的二十八家大银行发动进攻，很快地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寡头的这些反动营垒。接着，工人用暴力夺取银行的革命行动迅速遍及全国，从而剥夺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破坏了财政资本统治的经济根源，从根本上打击了资产阶级。列宁高兴地称颂这种革命行动是“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00 页）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抵制工人对铁路的监督，制造怠工事件，使全国三分之一的铁路运输瘫痪，造成了很大损失。为此，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召开了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宣布解散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铁路管理条例”。半年以后，所有私营铁路收归国有。到这时候，全国铁路已经全部变为国有了。

苏维埃国家为了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剥削，获得财政上的独立，打击国际资本对国内资产阶级的支持，采取了激烈措施，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宣布废除十月革命前俄国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积欠的全部债务。与此同时，强迫国内资产阶级一次交出一百亿卢布的革命税。对于那些拒绝参加消费合作社的商业资本家，则实行财产登记，规定他们：必须一律加入消费合作社，违抗者实行强迫劳动。一九一八年五月，宣布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制，同外国和外国个别企业交易任何

产品、原料全由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的机关来进行。十月革命后的不长时间里，苏维埃政权粉碎了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反抗，把银行、铁路、对外贸易以及绝大部分工业企业收归国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领域中建立起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可是，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决不意味着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已经完结，因为对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企业，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办企业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实际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企业实际归那个阶级所有。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中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也会对所有制起反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弄得不好，所有制还可能变质，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倒退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那些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又已经国有化的企业中，资产阶级的传统势力还很有市场，“**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散别涣散、肮脏、胡闹、懒惰的典型**”。（《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82 页）列宁批评苏维埃的报刊：不能有力地揭发这些事实上存在的黑榜，强调：“我们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不作声地容忍这样的工厂，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废物。”（同上书第 82 页）列宁非常痛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为一小撮人谋私利的“资本主义传统保持者”所控制的企业，号召大家与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列宁十分强调办社会主义企业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列宁对工人们说，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只注意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性的工人利益，那末，革命就保持不住任何一点成就。**”（《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45 页）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时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42 页）

在所有制变革中，列宁为了维护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一九一八年春——一九二〇年底，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叛乱，大批党员和优秀分子上了前线，许多地方的领导很薄弱。列宁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实行委派制。许多有组织能力的党员被派到各地去担任政治委员，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党又从红军中抽调了几千名共产党员从事经济工作，许多指挥员、政治工作者成了国营工厂厂长、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等的工作人员。到一九二二年，全国各地党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在各个企业的基层成立了党支部，党对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了。

在办社会主义企业时，究竟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领先，还是以能否获取利润为办企业的标准，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企业变不变质的重要问题。俄共(布)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布哈林公开提倡把捞取利润作为创办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极力鼓吹这种错误的主张。他们对于那些为国防建设所必须的，而又不能赢利的工厂，如普梯洛夫工厂、布良斯克工厂等，都主张强令其关闭。甚至他们还要求把许多社会主义企业让给资产阶级分子，放弃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列宁对这种机会主义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按照这个方针办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列宁谆谆教导全体党员和干部：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信仰和最终目标，决不要拜倒在“利润”的面前，而应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列宁经常提醒全党要重视调整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关系到完善生产关系，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大事。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强调企业里党的干部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普通劳动者，做人民的公仆。列宁无情地痛斥了一切高踞于群众之上，只想领导群众，而忘记必须向群众学习的人。列宁把不参加劳动作为每个党员干部的三大敌人之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必须“使在工厂和农业企业中工作的党员尽可能多的直接从事生产工作，在机床和耕犁旁边从事劳动”。

列宁始终认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列宁曾经说过：“**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广大劳动群众，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在一切国营企业里，实行工人管理，许多工作都由工人直接担任，自下而上地实行群众管理和群众监督。例如：一九一八年初，波戈斯洛夫矿区工人组织了业务委员会，学习管理生产，建立了群众的管理制度。对企业的一切活动、拨款、原料来源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产品的销售，都进行认真地检查和监督。对于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无穷智慧和力量，列宁总是给以高度的赞扬。

革命前的俄国，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还是个农业国家，从事农业的居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解决土地问题关系到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工农联盟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存在下去的大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首都的政权实际上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时，列宁就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把它们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应由革命法庭惩办。**”（以上均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363页）根据《土地法令》实行土地革命，其结果是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使农民能够分到一亿五千万俄亩以上的土地，获得地主的价值三亿卢布的农具，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约五亿金卢布的租金，并取消了贫苦农民积欠银行的三十亿卢布的债务。千百万劳动农民热烈欢迎《土地法令》，把它称为“神圣的法令”。

实施《土地法令》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在广大农村，社会革命党有很大势力，他们反对实行《土地法令》。在一些地区，社会革命党封锁颁布《土地法令》的消息，千方百计地阻挠土

地委员会的改选以及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使得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乡村的贫苦农民仍然处于地主，富农剥削之中。在另外一些地区，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遥相呼应，疯狂对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他们利用贫农缺少粮食、种子和农具的机会，强占贫农刚分到的土地，使贫农不得不再出卖劳动力为富农做工。这些富农还把千百万普特的粮食隐藏起来，并以数十倍于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继续从事剥削。也有的富农则利用《土地法令》，侵吞、私分地主土地，大发横财，并乘机大肆毁坏农具，以保持他们在农村中的剥削地位。有些地区的富农在社会革命党的指挥下，明目张胆地组织叛乱。在唐波夫省，他们屠杀贫苦农民和土地委员会委员，夺回贫苦农民手中的土地，恢复封建剥削制度。

不愿当奴隶的广大贫苦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同地主、富农和社会革命党等阶级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边远乡村的贫苦农民，组织上访团，长途跋涉，来到彼得格勒，反映他们那里的情况。列宁亲切地接见他们，向他们宣讲新的工农政权的任务，告诉他们实行《土地法令》是使劳动者摆脱苦难的第一个步骤。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府组织了由工人和复员士兵参加的下乡运动，开赴农村去传播革命思想，严惩反革命分子，组织当地人民**“把这种‘吸血鬼’揪出来，强迫他交出抢来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6卷第485页）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土地法令》广为传播，家喻户晓。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很快地遍及全国。

一九一八年夏天，全俄广大农村纷纷成立了“贫农委员会”，剥夺地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贫农委员会”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收购富农的余粮，将富农的五千万公顷土地转到了贫农和中农手中，富农的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被没收分给了贫农。

遵照列宁的命令，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审讯参加暴乱的富农和社会革命党人，把首恶分子统统处以绞刑。要对胆敢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坏家伙，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广大贫苦农民在贫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和支柱。列宁在评价这场斗争时指出：“**对农村来说，城市的十月革命只是到 1918 年夏天和秋天才成为真正的十月革命。**”（《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24 页）

十月革命后，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摆脱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状况发生了变化。中农在农村里的比例激增。沙皇统治时期，全国约有二千万农户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劳动，土地革命后，个体农民人数大大增加了。当时的苏维埃俄国，仍然是一个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国家。小生产是一种不稳固的经济，在存在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它必然会发生两极分化，一方面使广大小生产者贫困破产，另一方面则从其中(特别是富裕农民)不断产生出一部分新资产阶级分子。小生产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们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政权，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私有者，他们又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商品货币交换的环境中，又必然会从中产生商人和投机者。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分析俄国国内阶级状况时深刻指出：小生产“**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86 页）

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几年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相当严重的。有些人错误地看待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被打倒了，现在该轮到他们“捞一把”了。在国内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怀着这种发财欲望的农民，不顾大局，不管国家法律，不肯把自己的余粮卖给苏维埃政府，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背着口袋去自由市场卖高价。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在富农或投机商的拉拢腐蚀下，彼此勾结起来，走上投机倒把的道路，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站在一边，成为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象无数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包围着苏维埃政权，腐化着无产阶级。在工人内部，有少数人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经受不住暂时经济困难的考验，弃工务农，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回乡开自留地，经营菜园；有的则从事小手工业生产，制造打火机，

运到城市里，捞取“外快”。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内部。有的苏维埃代表变成了“议会议员”，有的干部为了追求发财致富，同投机倒把分子合伙营私，坐地分赃，堕落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敌。对此，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必须与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采取措施改造小生产者。

列宁还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强调改造小生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列宁指出，为了要消灭阶级，就必须把“**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逐步消灭工农间的差别，把农民都变成和工人一样的“**工作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列宁的这些教导，指引着苏维埃俄国的农村在实现了土地革命后继续前进的道路。

当时，在如何对待小生产的问题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以布哈林为首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视国内存在着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事实，绝口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从小生产者中间产生出来，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对小生产“不必监督，任其发展”等滥调，对抗列宁提出的监督、改造的方针。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党纲时，布哈林之流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求大会从新党纲草案中删去有关小生产的条文。列宁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扼杀共产主义的反动本质。

同时，列宁又指出，小生产者是劳动者，对他们不能象对待剥削阶级那样。对他们既不能镇压，也不能驱逐，只能采取诱导、说服教育的办法，吸引他们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的时期里，为改造小生产，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科斯特罗马省加里奇县沃斯克列先斯克乡，由十一个农民自发地组织了第一个农业合作社。二月十五日，在萨拉托夫省察里金县，由十五户贫苦农民组成了第二个农业合作社。对于群众的革命创造，列宁非常高兴，给了极高评价，并把这个社会主义幼芽加以扶持和推广。一九一八年底，在全国组织了一百五十个农业合作社。一九一九年发展到六百二十四，参加人数达四十二万。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农业人民委员部拨款一千万卢布，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同年十一月二日，撇了十亿金卢布特别基金，资助合作化运动，并采取措施，优先供应种子、农具、耕畜、化肥、机器等物资。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国营农场的法令，于是，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企业建立起来了，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拖拉机站，优先为集体农民代耕土地。这样，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雏形初步展现出来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了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列宁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用口授方法写了《论合作制》那篇重要论文，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说：合作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的任务的确就只有居民的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页）并强调指出：**“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采取这样的支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条件下，正确地组织起来的、拥有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是能用来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领导苏联人民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应该看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即使是小生产者成立了合作社，改造还只是刚刚开始，必须对他们继续进行积极的引导，否则，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弄得不好，它就会蜕变为“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到头来，只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绝大多数人重新陷入贫困和受剥削的悲惨境地。

四、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并存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宗法式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保存着多种经济成分、保留着不同所有制的情况下，为了实行城乡、工农之间的经济结合，解决全民所有制和个体农民之间的联系，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保持商品货币交换制度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列宁指出：

“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579页）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一文中说：苏维埃俄国的财政**“只有正确地组织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列宁选集》第3卷第750页）又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确定下来。”**（《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列宁还说：**“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750页）货币**“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列宁选集》第3卷第838页）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主要是按照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不断满足城乡广大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服务。同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用来管理社会主义生产、实现产品分配的工具，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

但是，列宁又尖锐地指出：**“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列宁选集》第3卷第838页）拥有货币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能够**“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750页）同样，商品制度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只要

存在商品制度，就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选集》第3卷第506—507页）这就是说，由于在商品货币交换领域里，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会引起两极分化。有些人利用某种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拚命占有商品和货币，搞资本主义剥削，把货币变为资本，把劳动力变成商品。社会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重新产生就将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种危险，列宁在论述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指出：对于商品货币交换的计算和监督，“**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的第二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选集》第3卷506页）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为了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限制商品经济前资本主义倾向，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

十月革命后，虽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开始了巨大的变革，但剥削者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大量货币和其它财产。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叛乱时期，他们除了公开参加武装叛乱外，还利用他们在金钱上的优势，兴风作浪，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进行破坏活动。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在俄国投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共有六十二亿卢布，其中竟有三十亿以上是资产阶级和富农抛出的。他们几乎垄断了商品市场。当时，国营商店里，日用品奇缺，而黑市上却应有尽有。富农们利用因自然灾害而粮食供应不足的时机，大搞粮食囤积，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破坏国家对粮食的收购和配给制度。一九一八年，在供应居民的约一亿二千一百万普特的粮食中，由投机商供应的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三。他们无视国家规定的每普特粮食售价九卢布七十七戈比的价格，私自提高到每普特七百二十四卢布，竟超出国家规定七十四倍之多。

“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农村中，富农的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在唐波夫省土那敏卡乡，有一个叫叶菲莫夫的富农，他利用粮食投机赚来的钱，开了一家商店，并购买了三十俄亩土地。另一个富农拥有一百五十俄亩土地，他开了一个磨坊，并以微薄的工资雇佣了一个工人，但每天却要工作十二——十四小时。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却很苦。贫苦农民维叶西洛娃，因无耕具，只好付出十一普特的谷物和三十五夸脱的牛奶，向富农租借。他的儿子为富农工作了两天，只挣得了一瓶灯油，结果还是由于缺粮，只得卖掉唯一的牛犊。城市的工人也因为资本家关闭工厂，而处于饥饿贫困的状态。

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直接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由于粮食投机商的破坏活动，使得城市里粮食供应不足，即使首都彼得格勒也没有足够的面包，工人每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口粮，有时甚至完全没有粮食吃。在前线，红军战士与外国武装干涉军、自卫分子浴血奋战，却整天忍饥挨饿。

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为了动员国内的一切资源，适应打退国内外阶级敌人武装进攻和打击国内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的需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的临时性的措施，于一九一八年，宣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首先从粮食问题上开始。列宁对粮食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必须实行国家的粮食垄断制，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的粮食贸易，必须把全部余粮按照固定价格交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火保存和隐藏余粮。”（《列宁选集》第3卷第561页）一九一八年五月，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同隐藏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特别职权”的命令，宣布粮食人民委员部有权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征收一切粮食。列宁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车站和征集地点的都是人民的敌人，应该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号召劳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无情的**

斗争”。(《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31 页)城市中的工人阶级闻风而动，仅彼得格勒一地，就组织了一百八十九个有近万人参加的征粮队。他们挖出了富农们藏在夹壁墙、地板下的粮食。一九一九年一月，政府宣布“余粮收集制”，把农民收获的作物，除去维持一家的生活和种子以外，全部征收。

为了打击商业战线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政府通过了一项禁止一切私人贸易的法令。当时，自由市场遍于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自由市场，是投机商例如粮食贩进行黑市贸易的中心。根据列宁反对投机活动的指示，莫斯科苏维埃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令封闭苏哈列夫卡广场。莫斯科市的工人纠察队和红军战士，冲进苏哈列夫卡广场，查封了这个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自由市场。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政府又颁布法令，重申不得私自运输、买卖粮食和其它产品，违者没收全部财产。

对于城乡居民所需要的产品，由政府监督供应，实行实物配给制。国家严格控制布匹、棉纱、皮革、马具、靴鞋、火柴、肥皂、蜡烛、煤油及其它日用品。在农村，由工人征粮队负责向农民用日用品交换粮食。交换中实行阶级原则，对贫苦农民少收余粮，并优先发给工业品，对富农则多收余粮，少给工业品。城市居民实行凭证购买日用消费品的制度。一九二〇年时，受国家供应的居民人数达三千八百万之多。工人和职工也实行了工资实物化的原则。这样一来，大大缩小了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的范围，限制和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

苏维埃政权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对外汇和保险事业实行国家垄断。但“**单靠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50 页)有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大量货币装满罐子埋在地下，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在彼得格勒一个进行投机活动的铁路小职员家里，曾经搜出几个装满了克伦斯基币的口袋。列宁指出：“**小资产者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累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这种典型的经济类型也就是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42 页)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

“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建立有钱一定要存入银行的制度等等。”（《列宁选集》第3卷第769页）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又提出了币制改革的计划，要货币拥有者用旧币向银行兑换新币，在一两千卢布以下按一比一兑换，超过一两千卢布的，只给一部分现钞，其余的则记在账上。列宁说，如果这样做，**“任何一个投机者都会原形毕露。”**（《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页）

但是，苏维埃政权对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的限制，遇到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的拚命反抗。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十分激烈。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李可夫，也跟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后面使助攻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公开反对粮食贸易垄断制，主张自由贸易，说什么实行粮食专卖是多余的，并提议依靠“私营贸易公司”来实行粮食垄断和采购。这是明目张胆地怂恿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对于那些反对粮食专卖的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或者完全为金钱而卖身的人才叫嚣反对粮食专卖。”（《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8页）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者攻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揭露这些人**“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坚持了对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实行统计和监督的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为打退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列宁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进行的。如前所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特殊情况下实行的。一九二〇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俄国进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当时，苏维埃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革命叛乱弄得贫困不堪。帝国主义强盗和白匪蹂躏了绝大部分国土，所到之处，破坏殆尽。一九二〇年的农业产量只及战前一九一三年的一半，工业产量只等于十分之一。由于缺乏原料和燃料，企业不能开工。一九二〇年，

产业工人人数只有一九一三年的二分之一。国内储存的金属和布匹都用光了。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衣服、燃料，甚至食盐都极端缺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农民更加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大肆活跃起来，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分子到国际帝国主义者，串通在一起，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动一些群众，发动叛乱，梦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乘机制造混乱。

面对着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列宁指出：“**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15页）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作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英明决策。在一九二一年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根据新经济政策，农民按定额用粮食向国家缴纳粮食税，多余的粮食可以自己支配乃至出售。新经济政策还允许私人贸易和开设小型私营企业。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振兴了工业，活跃了全国经济。同时，它也使自由贸易、商品流通和货币交换活跃起来，城乡资本主义因素乘机得到滋长。列宁指出：贸易自由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活跃起来，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这是被迫采取的暂时退却。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新的迂回方法**”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列宁坚定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

新经济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经过一年的实践收到良好的效果，初步扭转了经济困难的局面，工农联盟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起来了。一九二二年的粮食产量由一九二一年的十八亿普特，增加到三十亿普特。粮食税完全交足，消灭了饥荒。工业生产由原来的低落转为上升。工业总产值由一九二〇年的十四亿一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亿零四

百万卢布，一九二二年又增加到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卢布。生铁产量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每月平均七万普特，十月份达到十三万普特，十一月份达到二十七万普特。社会主义工业得到了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得到空前的加强。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又利用新经济政策竭力向劳动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复辟倒退思想，胡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开始，妄图把新经济政策引入歧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也利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这一年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监督下开办起来了，到一九二四年，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占整个工业企业的百分之二十。私人资本也渗入了商业和同市场有关的小生产者中，与社会主义企业争夺销售市场。私人资本控制了全国零售商业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农村的广阔市场，也被私人贸易所垄断。不少小业主和一些城乡小生产者，通过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成为新的企业主、商人、承租商、包卖商。有的甚至开办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领域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使得工人阶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出现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内外结合、互相勾结，成为一股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力量，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同盟军。

这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也日益激烈。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在新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他们又跳出来拚命维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主张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海关税，扩大自由贸易。他们还利用职权擅自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增加粮食税额，剥夺农民，扩大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在办工业企业问题上，他们坚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列宁一再强调，要给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以迎头痛击，要采取措施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效地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指示要“**重新配置力量**”，（《列宁选集》第4卷第633页）向资本家实行进攻。

苏维埃政府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狠狠地打击新资产阶级分子。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莫斯科第一次审判了三十五个搞破坏活动的企业主和耐普曼，①对他们分别作了法律制裁。接着，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运动。一九二二年，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府开始了法律的汇编工作，进一步建立了各种维护新的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民法法典，劳动新法典和土地法典。后来，这些法典成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立法基础。它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二二年夏季，在莫斯科审判了罪大恶极的社会革命党党魁。在法庭上，充分揭露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莫斯科等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和集会，表示拥护和支持苏维埃的这一革命行动，并要求政府严惩这些罪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十二名恶贯满盈的祸首，判处了死刑。

列宁认为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条件，要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向苏维埃俄国人民勾划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报告中说：“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399页）又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同上）列宁的一系列指示，指明了苏维埃人民前进的方向，并得到了落实。列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签署了《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命令》。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国统一经济计划和执行计划的方针和政策；制订各部门生产计划和审查执行计划的措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企业，等等。列宁非常重视对工矿企业的管理工作，在工厂实行了企业管理的经济核算制。在一九二〇年底国家经济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抽出五十万普特粮食作为供应工业的

储备粮。为了解决工业燃料和原料的运输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四日，列宁任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兼任交通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领导广大铁路工人，镇压了实行怠工和破坏运输的反革命分子，并对运输工作实行了经济核算，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确定了运输率，很快恢复了铁路运输。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使得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到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一一点八。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制糖业、农机制造业等都得到大幅度增长。

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党对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方面的全面领导。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掌握商业，指导商业**”。(《列宁选集》第4卷第579页)列宁一贯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利用商品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人，把他们同富农、骗子等阶级敌人一样论处。在一九二〇年，列宁就说：“**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复辟，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个别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全体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0页)政府颁布法令，重申任何人不得转卖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如个人出售农副产品的，必须持有自产证，否则，一律取缔。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苏维埃政府发布了改组消费合作社的命令，把原来只担负分配和供应职能的消费合作社，改组为城乡地方零售商品的商业合作社，并规定零售商人必须参加合作社。一九二二年八月，劳动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织国营企业股份公司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广泛建立了国营商店、商业公司、国营托拉斯等大型国营商业贸易机构，还建立上下之间的联系和物资调拨关系。这样，初步建立了小农与国家的正常联系，使国家掌握了商业命脉，促进了城乡交流，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

苏维埃政府很注意限制在货币方面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进行了两次货币改革，改变了纸币的型号，新发行的纸币票面型号为一、三、五卢布。同时使用银质及铜质的辅币。人民委员会宣布收回禁止流通的纸币。自一九二四年二月五

日起，停止发行不稳定的货币，流通以黄金作保证。卢布的币值稳定了下来。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大量储存货币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①耐普曼是指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资本家、商人和投机倒把分子。

五、贯彻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防止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利用政权的力量开始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变革的同时，在分配领域内，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从而废除了建筑在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按资本和特权进行分配的制度，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还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他说：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同时，列宁又指出：“**‘按劳分配’还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富裕程度的差别，成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无产阶级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在分配领域内实行革命是万万不行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的办法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绝不能去巩固、扩大和强化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贯彻巴黎公社的一项重要分配原则，即一切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与熟练工人相等的劳动报酬，享有相同的生活待遇，不允许搞任何特权。

列宁在《四月提纲》里就说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苏维埃政府里的一切官员，“**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这项措施会有效地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在谈到实行这项工资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时指出：它是国家政权性质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207页），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决议，决定“采取最有力的措施以降低一切国有的，公有的和私人的机构和企业中高级职员和官吏的薪金”。并规定：人民委员每月最高薪金不得超过五百卢布，无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一百卢布，每个家属的住所不得超过一个房间。决议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削减一切过高薪金和优抚金。半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中，又强调指出：要控制薪金、优抚金和津贴的发放，发放的数额不得超过当地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在国内战争异常激烈、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岁月里，苏维埃政府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把消费者规定为三类，一是体力劳动者，即工人；二是从事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的苏维埃机关和企业的职员；三是在私人企业团体和经济单位工作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这样显然不利于缩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差别，人民委员会很快又做出了决议：把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人合并为一类，并为他们规定了普通的供给标准。这些英明的决定，有利于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国家机关蜕化变质，成为官僚特权阶层。

列宁经常告诫全体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够也不应该为自己要求特权，不能把入党看作是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要警惕和防止党内腐化堕落分子的产生。一九一九年十月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决议，规定党的政治工作人员除工资外“**不得以奖金形式或加班费形式**

支付任何额外报酬。”一九二〇年九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工资问题决议”中要求：“**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一九二二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出规定：要坚决结束共产党员在工资方面的巨大差别，委托中央委员会定期解决党员工资过高问题，强调缩小党内物质状况不平等现象，对于“**‘共产党员’领导者的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自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工资、消费品供应的差别有某些扩大，但列宁始终坚持反对高低悬殊的方针。

在执行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法令中，列宁总是以身作则，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列宁的薪金同当时的技术工人相仿，每月五百卢布。一九一八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邦契—布鲁也维奇出于对领袖的爱戴，擅自把列宁的工资由每月五百卢布提高到八百卢布。列宁得知后，马上写信给邦契—布鲁也维奇，严厉指出这是“**破坏了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3 日的法令**”，是“**公然违法行为**”，并宣布给他“**以严重警告的处分**”。(《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329 页)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那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

列宁时时处处关心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无论是在阴霾密布的沙俄时代，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年代里，他始终和劳动人民过着一样的朴素生活。在国内战争异常激烈的时期，他和工人们一样地吃黑面包、白菜汤、麦片粥。一件还是在流亡时期穿着的破棉衣，二直穿到一九二四年他逝世时。为了使列宁更好地工作，同志们常常要求在学习上给他照顾一点，他是绝对不同意的。农民、红军士兵和省里的一些同志关心列宁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听到自己的领袖也时常和全国人民一样吃黑面包干时，他们纷纷把自己分得的食物寄送给列宁。据当时列宁的秘书莉迪娅·佛齐也娃回忆：有个红军士兵从外地赶来莫斯科，送给列宁半个大圆面包，并且说：怎么能让列宁吃黑面包呢，请他吃这个吧。但是，列宁对这些食物差不多都是婉言谢绝，或是转给医院、幼儿园以及需要这些食品的人。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列宁收到了

莫斯科粮食局送来的国营农场出产的水果样品，第二天就写了回信，要他们以后不要再寄水果等物品给他，并讯问医院、疗养院、儿童们是否都分到了水果。

一九一八年三月，当政府由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的时候，同志们劝他住一幢舒适的、宽敞的住宅，他不同意这样做，仍然住在和流亡时期差不多的几间小房子里。当列宁病重移居哥尔克村休养时，大家想把他安置在一所设备比较好的住宅，他马上拒绝了。列宁的办公室极其简朴，同志们经常向他建议，将办公室搬到大楼的另一端一间面积较大、较为舒适的房间里去，列宁也谢绝。就是主张给他换一张较大而好的办公桌，他也总是不答应。列宁经常到城市偏远的街道上去，为的是去看看“**我们的无产者在那里生活的怎样**”。他常常坚持步行。在寒冷的冬天，列宁不让他办公室生火炉子，同志们看他的脚都冻肿了，就在他的办公桌下面铺上了一张白熊皮。为此，列宁很恼火，要秘书马上将白熊皮拿掉。同志们再三解释，并告诉他在各个办公室差不多都铺上了白熊皮，他才勉强同意了。

列宁正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和鞭策着全党全国人民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和剥削阶级传统习气实行彻底决裂，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腐蚀。在列宁的伟大行动鼓舞下，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法令和决议，他们不是为了金钱，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莫斯科机械厂工人的最高工资为每月四百八十卢布。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机关及企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和专家中的党员，他们的薪金基本上同工人的工资相等。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建立，由于国际国内反革命势力搞武装叛乱，制造粮食饥荒，并占领了苏维埃俄国的主要产粮省份，切断铁路运输，经济条件是极其艰苦的。面包和肉类供应不足，工人生活困难。在这样的艰苦岁月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工人一样地吃着供给不足的黑面包。就连住在“国民”大饭店的中央机关也不例外。苏维埃政权，首先取消了这里精致、高贵的饭菜。

把过去每席有许多道菜，减成了两道菜。或者吃汤和菜，或者是吃汤和麦片粥。无论是谁，人民委员也好，服务员也好，只能吃到这两种中的一种。

在那紧张的战斗年代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工作异常繁忙，每天工作时间都达到十几小时之多，但食物供应却是很少的。有一次，在人民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粮食人民委员都饿晕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多么崇高的忘我精神。这样的斗争生活不仅在战争年代里，就是在经济情况好转以后，他们首先考虑的也是人民群众。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广大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否定了历来的当官做老爷的传统观念，保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劳动人民拥护爱戴的红色政权。

列宁还十分注意缩小劳动人民内部的工资等级差别，尽量缩小工人在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为了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有意造成了工人在工资和生活条件上的严重差别，特别是他们利用金钱收买了少数的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是脱离劳动人民，维护旧的剥削制度的社会阶层。十月革命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种资产阶级统治的流毒并不能一下子消失，列宁指出：**“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还不可能完全消除人与人之间在分配上存在的事实上不平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二〇年四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工人仍实行八级工资制。但是，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八级工资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等级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中进一步规定，**“应当尽量缩小各个等级之间的差额。”**这些决议为缩小工人内部的生活待遇差别提供了可靠保证。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85 页）苏维埃政权为过渡到这种分配制度创造着各种条件。首先，在缩小工人工资等级数额的基础上，还注意限制那些工资待遇较高的工人。其次，注意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和生活待遇。俄共(布)党的会议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工资还低于中等水平的那些基本工业部门和生产地区的工人的工资”。苏维埃俄国的铁路员工工资比较低，一九二四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增加了铁路员工的工资待遇。列宁对那些对饥饿工处持官僚主义态度的领导是极为不满意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工人内部的两极分化，事实上是帮助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一九一九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四十二个团体组成了饥饿工人委员会，控诉了辛比尔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的失职行为。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在给辛比尔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的信中，要他们迅速把救济饥饿工人的事情做好，如果做不好，就要逮捕有关的人员，并送交法院。

苏维埃政府主张，工人待遇要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提高。这样有利于激发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中指出：**“一切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都有责任关心如何组织工业生产，使工业能够迅速而充分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应当随着这方面所获得的成绩的大小，增加产业工人工资，改善他们生活。”**（《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50 页）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同时，苏维埃政府清楚地看到，由于各个行业、工厂的发展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工资数量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发布一项决议中指出：由于各个国营企业的发展及盈亏不同，要纠正那种**“由于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偏向而造成的经济机关的错误和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57 页）一九二三年四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资”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今后总的工资政策应当是：或多或少的拉平一切工业部门的平均**

工资”，工资的发放要**“尽可能不受市场局部波动的影响”**。这些决议，有力地限制了各企业间工资发放的不平等。有些部门不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决议，破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工资原则。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国家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超过最高工资限额多发给职工报酬者，应受刑事处分，职工超过工资限额多领取报酬者，应交回多领部分，采取欺诈手段非法多领取报酬，要给予处分。这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搞经济主义，妄图扩大劳动人民内部等级差别的行径，无疑是当头一棒。

列宁非常强调改善俄国妇女的生活待遇。把这项工作看作是缩小劳动人民内部差别的重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的经济地位是根本没有保障的，生活待遇更是低于一般工人。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国，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得到了迅速改变，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力。苏维埃政权加强**“在改善女工生活方面的工作，使她们的生活随着整个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而改善”**。

苏维埃俄国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了高薪“赎买”的政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尽快地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化、科学、技术、艺术，都被资产阶级专家所垄断，这就需要吸收他们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为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这土壤上绝对不能再生出任何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501页），列宁提出了对资产阶级专家采取高薪“赎买”政策。一九一八年一月，人民委员会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请求，决定“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额报酬”。一九一八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所通过的一项决议中，也**“承认有必要在整个工资制度中实行这种改革”**。（《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也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过去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这项政策一提出，就受到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对和歪曲。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方面公开提出要把收入四千卢布以上的人统统枪毙，另一方面他又

到处散布，说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怎么看也看不出违背原则的地方。这都是葬送革命政权的阴谋手段。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这是一项“贡款”，在当时条件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说：“**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页）“**绝大多数觉悟了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列宁选集》第3卷第503页）但列宁又说，这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同上书第502页）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有的人就会满脑子资本主义发财致富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化公为私，贪污腐化，充当盗窃国库的“明星”，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列宁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告诫大家要从思想上警惕，在行动上抵制这种高额薪金的腐蚀作用。同时，列宁号召无产阶级立即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尽快地掌握科学技术，以便迅速地缩减和摆脱向资产阶级专家交纳的一切“贡款”。

列宁给专家高薪是有条件的。第一，被“赎买”的资产阶级专家必须为苏维埃政权老老实实地工作。列宁经常号召工人农民要在工作中监督他们，对他们的任何怠工和破坏活动都要进行打击。“**如果他们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老老实实全面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列宁选集》第3卷第323页）列宁的路线，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不少资产阶级专家被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列宁在一次总结工作的会上指出：由于我们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赎买政策，使“**我们争取到几十个、几百个浸透了资产阶级观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正在汇集成册，编印许多小册子。**”（《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1页）第二，苏维埃政权采取必要措施，限制资产阶级专家的工资收入，使他们同工农群众的工资待遇差额不致于过于悬殊。一九一九年，劳动人民委员向列宁汇报说：我们在平衡工资方面所作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做过而且在今后都不可能做到的。根据列宁的指示，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规定“**最高工资数额**”的决议，最高工资的具体数额，在不同时期由专

门决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企业都必须遵守。例如，一九一八年规定的最高工资数额为每月三千卢布，超过部分一律归公。这个最高工资数额的规定，不仅为包括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在内的一切高薪者勾划了一道极限，使他们不能无限制地去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追求货币。对于那些企图维护旧有特权，扩大等级差别的资产阶级专家，则进行坚决打击。沃龙涅什农学院教授姆·杜克尔斯基，因为不满自己的生活状况，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他说苏维埃政权干涉了他们的私生活，并扬言他不会为苏维埃政权去出力。对这封信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作了答复，列宁尖锐地指出：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让士兵们得到休息，知识分子应当挤一挤，这是正当的要求。**“若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或者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知识分子，也明显地要求自己的伙伴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疲惫的士兵，对待过度疲劳的、为几世纪的剥削所激怒了工人，那末，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接近的事业便会大步前进。”**（《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02 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转变时期，**“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16—517 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苏维埃的机关中，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工人阶级中都产生出了一部分背叛无产阶级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已经出现的腐化堕落现象和一部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初给那时的司法人民委员部写了一封信，指令司法人民委员部必须立刻**“提出一项关于惩治贿赂行为”**的法令，对那些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分子**“要判十年徒刑，并强迫劳动十年。”**（《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328 页）一九一八年五月八日，人民委员会用法律形式颁布了这项法案，着重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而犯罪，接受贿赂的国家职员，给予法律制裁，判处五年以上剥夺自由和强制劳动的徒刑。而对行贿者，及向职员行贿

的教唆犯和共犯规定应当同受贿人员同样受到法律制裁。党的代表大会也经常号召全体党员，要同在党内培植资产阶级习气的现象作斗争；要清除一部分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耐普曼化”的工作人员。列宁尖锐地指出：“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爬到一个安乐窝里去。怎么办呢？要再三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清除他们，赶走他们”。（《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页）

在打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任何软弱的表现，列宁都是不许可的。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关于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四个党的干部受贿的案件，给了受贿者以轻微的处分，只判了六个月徒刑。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写了《给俄共中央的信》，强烈要求中央作出决议，把审判这个贪污案件的党员开除出党。列宁尖锐地指出：“不枪毙这样的贪污犯，而判了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开除出党”。（《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8页）列宁认为，只有毫不留情地同一切不良倾向和形形色色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党组织以及国家机关的纯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免遭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瓦解。

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并为这项原则的贯彻执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苏维埃俄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千难万险没有能够阻止苏维埃政权的进军步伐，它在斗争中日益地巩固和强大起来。是什么力量鼓励着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夺取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它是和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实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干群一致，铲除等级森严的剥削阶级观念，消除生活上的极端悬殊分不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英明政策，使全体劳动人民懂得应当怎样生活，怎样战斗，激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这正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六、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而斗争

十月革命后，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加紧从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当时，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咬牙切齿地宣称：“有一个领域，我们在其中还没有变老，恰恰相反，我们越活得久，我们就越有经验，越有力量。”这个人所说的就是指的思想意识领域。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

资产阶级利用他们还把持着的新闻出版机构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即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报刊公然刊载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苏维埃宣言，号召反动势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反扑。对此，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采取了措施，当天就派赤卫队封闭了一些反动报馆。十一月九日，公布了列宁草拟的《出版法令》。这个法令宣布对资产阶级反动报刊一律予以封闭。在革命胜利的几天里，在彼得格勒，各主要资产阶级报刊都被查封了。

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勾结起来，猖狂反对《出版法令》，向苏维埃政权要求所谓“出版自由”的权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跳出来为剥夺资产阶级出版权利鸣冤叫屈，说什么要用“说服的办法”和“革命的诱导”的方法，而不要采取“斗争的方法”等等。这些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苏维埃政权拒绝了。列宁说，“**我们不能让资产阶级有诬蔑我们的机会。纵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7页）一九一八年六月，混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全部被开除出去了。这也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踢开了绊脚石，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一九一八年八月，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资产阶级报刊被全部查封了，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出版权。苏维埃政权在破坏旧的报刊机构的同时，加强了无产阶级报刊的出版工作。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真理报》复刊。十月革命前，《真理报》曾几次被迫改换名字，这时，才公开地恢复了它光荣的名字。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工农临时政府公报》开始出版。十二月一日，《赤色报》也创刊。以后，各种报刊相继出版。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共有了五百二十八个报馆，每期印数近二百万份。这些报刊在全国各地传播着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对于动员人民群众自觉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哲学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十月革命后，社会上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引起哲学上的斗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思想家，出于他们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竭力宣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用主观唯心主义看待形势，夸大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形势，要求苏维埃政权屈服于国内外资产阶级。他们还利用宗教组织进行种种反苏维埃的活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各种措施，广泛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二二年一月，布尔什维克创办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莫斯科出版了。后来，列宁在这个杂志的第三期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揭露了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的阶级实质，指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都依附于资产阶级，是“现代的‘有教养的’农奴主”（《列宁选集》第4卷第612页）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要对旨在煽动复辟倒退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坚决斗争。列宁指出要把这个杂志办成一个战斗的机关报，来揭露和追究反动派的哲学仆从、黑暗势力的御用学者及一切资产阶级的维护者。这篇文章成了思想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

的战斗纲领。在列宁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真正成为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报纸。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阶级敌人惯于在革命队伍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俄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被列宁称为“变相的”孟什维克、新型的取消派和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正是这样的人物。波格丹诺夫从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就开始从事反马克思主义活动。十月革命后，他利用窃取的文化协会负责人的职务，伙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贩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鼓吹“教育脱离政治”，否定在文化领域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他从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可以不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离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这个荒谬的观点，就必然导致脱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仅仅用“实验室”的方法，单凭特殊的文化教育团体的力量就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一九二〇年十月，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了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在会上，列宁严厉地批判了波格丹诺夫之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动观点。在这一时期，列宁先后发表了《共青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和《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对于波格丹诺夫之流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列宁说：

“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是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一丝一毫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必须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战胜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的进攻,使文化教育事业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资产经济在同无产阶级斗争时采用腐蚀、欺骗和拉拢群众的方法,甚至使得一些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老革命家在十月革命后也发生动摇。如曾经热情欢呼过革命风暴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就在新形势下被资产阶级怜悯的锁链所束缚,失去了革命的警惕性,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年代却抱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太过火了,是不必要的“残酷”。

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在繁忙的工作中写给高尔基一封信,列宁要求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这是列宁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给高尔基也同样是给那些处于资产阶级包围、头脑不够清醒的革命同志指出的前进方向。列宁认为,这些革命同志所以被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等言词所欺骗,关键在于这些身为工人作家的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脱离了现实的阶级斗争,使自己困于“彼得堡”内**“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0页)所以,列宁要求这些人**“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2、411页)抵制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进行磨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列宁给革命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

十月革命后,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势力还十分强大,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企图依仗他们在教育阵地的优势,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把学校变为他们搞复辟的基地。列宁十分重视在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亲自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明确指出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3卷第765页)的光辉思想。为达到这一目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展了教育革命。

列宁认为，要使学校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吸收广大的工农劳动者入学，培养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一九一八年八月，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的决议，八月六日公布于中央各报。这个决议废除了有产者的特权，提出**“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页）为了使工农群众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规定了大学入学的学生不需要中学毕业的文凭，废除了竞争式的入学考试，并且决定学生免缴学费，这就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群众进入高等学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广大的工农群众进入高等学校，有利于改变旧学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

劳动群众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体现了旧制度的旧思想、旧意识还存在，这些必然要影响到无产阶级内部，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学生出现了蜕化变质的危险。列宁指出：为了**“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列宁选集》第3卷第765页）一九一八年十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统一劳动学校的条例》，明确地提出：**“生产劳动是学校生活的基础，生产劳动应当与教育密切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劳动原则将成为强大的教育手段。”**一九二〇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又明确指出：**“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355、356页）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列宁给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指出的光辉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新一代、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可靠保证。

十月革命后，如何对待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列宁指出：**“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成共产主义，只能用资产阶级环境培植的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如果谈到**

作为文明机构一部分的人材的话)的文明机构来建成共产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就在这里，但可能建成和胜利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保证也在这里。”（《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367 页）列宁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愿意接受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的，但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且在全国国民教育委员会这一资产阶级组织的煽动下，以怠工和资产阶级偏见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

列宁认为，必须同这种怠工行为进行斗争，要教育广大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地抛弃他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树立为社会主义而工作的思想。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列宁下令解散了反苏维埃的反动堡垒全国国民教育委员会。同时，党从组织上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全国教育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任命了全国教育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一九一八年一月二日，列宁又亲自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任命克鲁普斯卡娅等四人为政府委员，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列宁还采取了多种形式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教育。他多次对教师发表演说。一九一八年夏，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学的基本原理，给革命的知识分子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列宁说：“**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的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18 页）列宁的多次演说，展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广阔前景。

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对教育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法权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苏维埃政府下令取消了博士、硕士学位制度，废除了功勋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等等学位。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条例，“对教师的等级一律取消”。这一系列革命措施，打击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掉了那些顶着教授头衔、戴着博士桂冠的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威风，有

利于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扭转一些青年对资产阶级教授顶礼膜拜的状况，使青年一代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十分长久的历史，给人们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这些人只关心自己，不顾别人。这种旧思想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也影响到工人阶级内部，正是这种传统的私有观念的存在，使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还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条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要使这种复辟不可能，只有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投机，反对小经济，只有抛弃以前存在过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原则。**”（《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1页）列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目标出发，十分重视动员人民起来同传统的私有观念进行斗争，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

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国外武装干涉者和自卫分子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提出以实际行动战胜高尔察克的倡议，决定在全局内实行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根据这一决定，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该铁路分局的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和党外的积极分子，举行了第一次义务劳动。尽管当时这些工人每人两天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面包，可是，这些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工人忍饥挨饿，团结奋战，六小时就完成了四台机车和十六节车厢的修理任务，卸完了几千普特的货物，比平时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近两倍。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一出现，列宁就热情地称它为“**伟大的创举**”。列宁说：“**‘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

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页）

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等著作，向人民群众阐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意义，表扬了许多共产党员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先进事迹。在列宁的推动下，苏维埃共和国内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是同传统观念决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列宁在百忙中亲自参加清理克里姆林宫广场的义务劳动。劳动中，列宁抢着重活干。据当时和列宁一起劳动的包里索夫回忆说：“列宁劳动的很出色。他抬着木头走的飞快，超过了其他的人，他不是走而是跑，他的动作敏捷，仿佛是说劳动就应当这样。”列宁为革命人民做出了光辉榜样。

列宁考虑到，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必须让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和广大工农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列宁的倡导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把长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人员派到机床和耕犁旁去工作。以后，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又重申，必须开始逐步地实现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并且规定对派下去的人员**“应按工人的普通生活条件对他们进行安排”**，“**必须注意使在工厂和农业企业中工作的党员尽可能多的直接从事生产工作，在机床和耕犁旁边从事劳动等等，而不是仅仅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这些措施是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永远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重要保证。

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个斗争是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一九二一年以后，苏维埃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对于发展苏维埃国民经济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乘机活跃起来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

“路标转换派”这不反动的小集团开始猖獗起来了。“路标转换派”代表着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最初存在于侨居国外的白卫知识分子中间。一九二一年夏天，布拉格出版了一种称为“路标转换”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的作者的首领是过去的高尔察克的总长乌斯特亚洛夫。这个小册子的编纂者恶意诬蔑说，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放弃了共产主义建设，转到了资产阶级轨道。因此，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合作，企图把苏维埃政权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府。“路标转换派”极力美化西方资产阶级，仇视苏维埃政权，妄想迫使政府把国有化的工厂和银行归还给资本家，结束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恢复土地私有制。他们钻入苏维埃政权机关、文化教育部门，暗地里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破坏活动。“路标转换派”的反动思潮渗透了报刊、科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在这种反动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也闻风而动。“工人集团”，“工人真理”，“工人反对派”等反动组织的残余也拚命活动起来。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地下出版社，也为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鸣锣开道。

这种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样在高等学校表现了出来。资产阶级教授们公开要求大学独立，不受苏维埃政权的领导，等等。

当时有一个名叫《经济学家》的杂志，是俄罗斯技术协会第十一分会的机关报，它充当“路标转换派”的吹鼓手，疯狂散布复辟倒退的思想。一九二二年三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深刻地指出，“路标转换派”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潮“**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列宁选集》第4卷第636页)列宁根据对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的分析，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指出了斗争方向，深刻地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的指示，封闭了《经济学家》这个反动杂志。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对于那些阴谋搞复辟的各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地下出版社都坚决镇压和取缔。同时，苏维埃政权大力发展出版事业，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大力设立出版社，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宣传书报。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把政治教育总局出版

社改为出版通俗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社，并要求出版社应当满足工人群众的要求，要采取一切办法来编写和出版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要选派足够的力量来做这项工作。一九二一年建立了“红色新园地”，一九二二年建立了“青年近卫军”和“莫斯科工人”以及其他一些出版局，出版了多种多样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书籍和文艺读物，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使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要求，组织必要数量的干部、党员参加研究班。同时提出要在农村加强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要求地方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农村阅览室的作用，提出了“要有固定的、靠当地资金维持的农村阅览室网，每乡至少有一个农村阅览室”。

列宁很重视加强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的革命。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主要工作应当放在工农的创作上面；要培养一支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文艺创作队伍；要加强党对文学、电影、戏剧工作的领导，提倡革命的文艺创作。这些指示对俄国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依靠人民群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宁指出：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力量依靠什么呢？依靠人民群众。这就是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统治人民、统治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统治少数人，统治一小撮警察暴徒，统治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僚的政权机关。……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狡猾手段，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于政权之外，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它是靠欺骗来维持的。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

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5—316页）列宁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列宁把这看成是苏维埃政权胜利的保证。

列宁一向重视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运用了多种形式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列宁经常参加工人、农民和红军的各种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向大家讲解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政策和法令，号召群众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的头两个月里，列宁就在群众大会上作了二十多次演说。有时一天要作好几次讲演。例如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他就在派往前线的军队动员大会上，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在华沙革命兵团，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以及在霍亭卡的红军战士大会上，一共作了五次讲演。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年代，即一九一八年春至一九二〇年底，列宁在群众集会上总共发表了二百一十六次演说。列宁为了使群众都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参加群众大会发表演说。一九二二年底，列宁在病重期间，因遵医嘱而不能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和代表们讨论党和国家大事，心里非常不安。列宁还在广播、报刊上发表各种信件、文章、呼吁和号召。在十月革命胜利头几周里，列宁在《真理报》上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列宁在晚年的两年期间，就在二十多篇文章中谈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必须发挥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镇压一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各种反抗。列宁认为，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列宁指出：“**国家是镇压机构。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构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列宁选集》第3卷第482—483页）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初，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破获了一起大规模的白卫叛

乱阴谋。这个反革命叛乱集团是由英法帝国主义者直接操纵的，他们妄图收买一些群众和士兵，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广大群众和士兵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并积极帮助肃反委员会逮捕了正在秘密开会的反革命首领，使他们的叛乱阴谋没有得逞。十月革命后的斗争事实充分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只有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工农群众，才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使尽一切卑鄙手段，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他们策动旧的国家机构，如旧的政府各部、银行、邮电部门的职员拒绝服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实行怠工。面对阶级敌人的猖狂挑战，列宁认为，当时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列宁指出：“**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任务日益提到了首位，这个任务比进行大规模建设的任务更急迫。**”（《列宁全集》30卷第296页）列宁号召广大群众必须学会管理国家，“**他们不学会这一点，正如大家早就从‘国际歌’里听到的，谁也不能帮助他们。**”（《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页）列宁还一再说，任何人不是天生下来就会管理国家的，劳动群众也不是从书本中或课堂里，而是在亲自参加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教育，学会管理的。所以，列宁说：“**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从他们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有联系，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不然工人政府的权力就会没有力量，而这种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列宁选集》第4卷第298页）

唯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力量。第一个被实行国有的工厂——利金纺织厂的历史，就是广大群众进行管理的一个生动事例。这个工厂的工人群众看到了企业主破坏生产，就主动的成立了工人管理机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列宁亲自签署了将该厂收归国有的法令。这时工厂的一些高级职员和工程师拒绝上工，妄图以停工来抵制这一法令。广大工人群众以主人

翁的姿态，坚持生产，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赤卫队、贫农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大量地选拔坚定的、在革命斗争中受过考验的、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列宁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这是完全战胜剥削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大厦的决定条件。

在革命的进程中，列宁看到了一些国家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滥用职权、拖拉作风以至腐化变质的现象。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列宁认为，为了克服国家机关存在的这种现象，防止国家机关改变颜色，单单靠工会、贫农委员会等群众组织是不够的，而必须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在列宁的倡导下，一九二〇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条例。二月八日，正式颁布了关于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工农检查院的职责，过去是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处执行的。而新建立的工农检查院则是吸收工农群众实际参加管理国家的组织形式。它在改组和巩固苏维埃国家机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广大群众通过工农检查院考查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监督国家机关各部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揭发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不良现象，清除那些混入国家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广大工农群众通过参加工农检查院工作，学会管理国家。然而，叛徒托洛茨基却极力反对这样做，妄图取消工农检查院，改变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揭发和批判了托洛茨基这一反革命罪行，严肃指出，在工农检查院问题上，托洛茨基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在当前情况下，“**没有工农检查院是不行的。对工农检查院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经常的、坚持不懈的工作，使它成为一个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的机关。**”（《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5页）

工农检查院成立后,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导不能充分发挥工农检查院的作用,列宁非常生气。他指出,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没有符合我们的愿望。工农检查院实际上“**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们的助手。**”(《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页)列宁严厉批评了各地领导在发挥和依靠广大群众问题上的缩手缩脚的现象,要求立刻改组工农检查院,进一步发挥工农检查院的作用。

一九二三年,列宁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用口授的方法写完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论文。这是列宁最后的两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革命后的六年时间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并充分肯定了工农检查院在斗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指出了发挥工农检查院作用的问题。列宁提议将工农检查院同党的监察委员会合并,工农检查院的委员负有和同级党的监察委员一样的责任。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合并了这两个组织,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工农检查院的作用。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错误和缺点,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列宁指出:“**应该有更多种类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3页)广大群众的来信、来访、提意见甚至控告,是自下而上的实行群众监督的一种好方法。列宁很重视这种方法。他责成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审阅一切书面请求和控诉书。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列宁指示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说,一切书面控诉,都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他报告,即使口头报告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向他提出。后来根据列宁的指示,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接待室。为了方便上访群众,接待室设在克里姆林宫外面。所有给人民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件和控诉书,都要送到这里来。根据列宁的指示,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秘书负责将群众的信件和申诉交代处理,每

两周向列宁报告一次总的情况。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列宁同总务处长谈话时指示说，要使接待室成为人民群众和各人民委员部密切联系的桥梁。在工作中，要注意发挥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院的作用。要通过《消息报》回答广大群众各种请求和控诉，并就这些问题发表综合性的文章。同时，要及时通知来信来访的群众，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转到什么地方处理了。一九二一年底，列宁得知接待室转给苏维埃机关的一些群众意见和上诉信件没有下落。他立即写信给中央有关的领导同志，指出：要认真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问题，对于严重问题，应该同有关的负责同志联系，如捷尔任斯基等同志，及时地加以处理。列宁在给中央机关领导同志的信中，还指出：在准确地、认真地、迅速地处理群众的意见和申诉的时候，“**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有权不管‘级别’，对于犯错误的人追究责任。**”（《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第235页），列宁要求每一个苏维埃机关、工厂、企业都要热情、诚恳地接待广大人民群众给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批评。还规定所有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不仅贴在屋里，而且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素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列宁说：“**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2—253页）列宁不但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做，而且自己也这样做。一九一八年底，列宁接到特维尔省的一个女教员伊万诺娃寄来的控告信后，就给该省执行委员会去信，要求他们马上处理控告信揭发的问题。列宁指示，如果调查属实，就应该作出处理，并把处理情况告诉群众。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消息报》刊登了记者米赫里斯的一篇短评。这篇短评，揭发和批评了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线利季诺站仓库积压二百五十万普特金属货物，长期抛在野外无人过问的现象。列宁看到这篇短评后，严厉的批评了这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立刻给小人民委员会①主席基谢廖夫去信，要他立即查办这件事。

列宁指示要对那些因群众进行揭发检举而进行打击报复的人，给予严肃的处理，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一次，一个名叫布拉托夫的群众，因为向列宁揭发了诺夫哥罗德省苏维埃机关的错误，而遭到了该省机关工作人员的打击，被关进了监狱。列宁知道后，马上打电报给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要他们查办此事，马上释放他，并指出：如若置若罔闻，就要采取严厉措施，直到逮捕和法办他们。革命导师列宁就是这样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要加强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必须依靠群众，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的队伍，发挥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战斗指挥部作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国人民都来检查我们的方针**”。（《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9—400页）。

党的建设之所以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决定的。因为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不是一个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进入到党的队伍，资产阶级利用各种腐化手段从党的内部破坏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列宁认为，对这种现象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把那些资产阶级化了的人驱逐出党，这是党顺利进行斗争的先决条件。列宁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监督来实现上述的任务。

列宁强调，每一个党员都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洗刷非无产阶级思想。列宁说：“**非无产阶级群众，以及许多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极其宝贵的。……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重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21页）列宁在这里强调了依靠群众加强党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归根结底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利于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〇年三月，列宁亲自主持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不管他们担负何种职务，都应该编制到工厂、红军或农村的支部中去，他们经常向党员和群众汇报自己的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注意选拔大量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年青优秀党员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如任命三十二岁的斯维尔德洛夫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基洛夫为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古比雪夫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后又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联合机关的主要领导工作。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它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起到了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①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成立，它相当于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人民委员会的日常琐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必须经过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批准。

八、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

在十月革命后的六年多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的革命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始终是围绕维护党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还是搞修正主义，分裂党，破坏党的统一，损害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这个原则问题进行的。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连续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反党阴谋，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了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保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的大道上胜利前进。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德国军队随时可能向俄国发动全面进攻。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指出：单独同德国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

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415页)相反，如果继续进行战争，就是拿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作孤注一掷的冒险，就是葬送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场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斗争中，隐藏在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拚命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充当了敌人的可耻帮凶，起到了名声很臭的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所起不到的作用。托洛茨基提出什么同德国人“不战不和”的荒谬主张，说：“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不签订和约”。他以隐蔽的形式推行继续战争的政策。以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一唱一和，公开反对签订对德和约。他们高唱“左”的论调，制造“德国人不会进攻”的谎言，鼓吹“没有军队也要进行战争”，甚至卑鄙地攻击坚持列宁路线的同志。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复辟愿望。列宁在批判他们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这伙人有意要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资产阶级设的圈套里去，“**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页)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反党活动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当时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如莫斯科、乌拉尔区域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等都听信了他们的谎言。列宁关于签订和约的正确主张曾一度在党内处于少数的地位。

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厉批驳了他们的机会主义谰言，痛斥他们是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是要断送苏维埃政权。同时，列宁反复向全党说明签订和约的道理，在党中央委员会争取通过了列宁的正确主张。

然而，窃据苏维埃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竟违抗列宁关于接受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的指示。他在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时，拒绝签订和约，并声称：苏维埃政府决定继续复员军队，不进行战争。由于托洛茨基的叛卖，和平谈判中断，德军乘机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俄国

的大片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在这紧要关头，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奋起保卫祖国，成功地抵抗了德军的进攻。

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作顽强的斗争时，愤怒斥责他们的叛卖行径，斩钉截铁地说：

“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列宁还指出，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

为了教育全党，列宁进一步深刻地阐明了革命的妥协和机会主义的妥协之间的原则区别。他说：**“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同上书第194页）

在列宁的坚决斗争和耐心教育下，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接受了列宁的正确路线，团结在列宁的周围，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反党路线。后来在同德国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德国的条件比原来的更加苛刻了。不仅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割给了德国，乌克兰变成了德国的属地，而且苏维埃政府必须按期向德国缴付巨额赔款，恢复在一九〇四年德国强加在俄国身上的不利的贸易条约。这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极力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过。

布哈林之流“左派共产主义者”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他们继续拉拢一些地方党组织同中央相对抗，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布哈林利用他所把持的莫斯科省委会，通过了被列宁斥之为分裂和反苏维埃的决议，它公然声称为了“国际革命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对于这种“奇谈与怪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列宁选集》第3卷第445页）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全部反党阴谋。一九三八年初，在审判反苏维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时查明：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曾勾结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妄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并杀害列宁和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推翻苏维埃政府，由他们取而代之。这就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路线的反革命本质。

为了最终解决和约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列宁科学地总结了十月革命前后和国际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斗争经验，指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和约是战争的喘息时机”。(同上书第470—471页)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苏维埃俄国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一种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向敌人进攻而做的必要妥协。它既坚持了革命原则性，又适当地表现了革命斗争必要的灵活性。这次大会，确认了列宁在和约问题上的正确路线，批驳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分裂阴谋，使全党进一步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

一九二〇年底，苏维埃国家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很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伟大领袖列宁提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英明决策，以便整顿国内经济，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党的政策转变的紧要关头，国内外反动势力加紧向布尔什维克党进攻。他们改变了明火执仗的进攻手段，打着“拥护苏维埃”，但“不要布尔什维克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旗号，妄图反对党对苏维埃的领导，使苏维埃成为一个空壳，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这场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表现得异常激烈。当时，党内不少人在思想上是混乱的，在政治上动摇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少投机钻营分子混到党内来。有些在十月革命前还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①和博罗提巴分子②也摇身一变，混入党内。

他们同社会上阶级敌人遥相呼应，造谣生事，中伤党的方针政策，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而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却利用这个时机，推波助澜，利用关于工会作用问题，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工会作用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政策问题，但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召开的全俄职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借口辩论职工会作用问题，提出所谓“把螺丝钉扭紧一下”，反对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还反对在人民内部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用强制的军事手段，“把工会整刷一下”，推行所谓“工会国家化”，即由工会取代党对国家的领导。

事实表明，争论已远远超出工会作用问题，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出席会议的代表，坚决抵制和严厉驳斥了托洛茨基机会主义的主张。会后，列宁继续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斗争，进一步批驳了托洛茨基反对施行新经济政策的错误，指出只有施行新经济政策，才能在恢复农业的基础上振兴工业，为工农联盟奠定新的经济基础。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党必须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发挥工人阶级及其群众组织——工会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相反，**“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末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列宁选集》第4卷第204页）然而，托洛茨基提出的“整刷”工会的口号，主张“工会国家化”，目的在于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妄图把工会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拖向后退”，“是开倒车”**。（同上书第405、418页）列宁在同托洛茨基斗争中，深刻论证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性质和作用，论证了党、国家、工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列宁明确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无产阶级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并指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同上书第 403、404 页）

但是，托洛茨基丝毫没有改变其反动本性，反而在机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违背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把中央内部关于职工会作用问题的分歧公开到全党，逼迫党进行争论，并声称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即在托洛茨基机会主义路线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之间进行选择。

托洛茨基的反党分裂活动，得到了另一个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的支持。在争论中，布哈林纠集起一个所谓“缓冲集团”，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子，为托洛茨基机会主义辩护。托洛茨基诬蔑列宁仅仅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是“从经济上”看问题，是“关心生产”的。布哈林却站在折衷主义的立场上，胡说什么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都具有同等价值，但都各自偏重一方。以此掩护他们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阴谋活动。

跟着托洛茨基后面反对列宁的还有“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在经济建设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民主集中派”则主张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公开鼓吹搞分裂活动，反对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

理论是路线的思想基础。列宁认为，如果不揭穿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所“**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49 页）列宁批驳了布哈林的错误观点，深刻论证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同上书第 441、442 页）列宁进一步揭穿了布哈林“缓冲集团”的反动实质，指出他们只“**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

帮手”。(同上书第 428 页)列宁痛斥了“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纲领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反革命纲领如出一辙。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在政治上搞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搞分裂主义，破坏了党在列宁主义路线上的团结，给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极端的危险。

列宁认为，托洛茨基蓄意挑起的争论“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同上书第 406 页)如果不击败他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政治大厦”就有被冲垮的危险。因此，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号召全党迎头痛击托洛茨基之流的猖狂挑战。

全党热烈响应列宁的战斗号召，同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在莫斯科，这种斗争更加激烈。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集中主要力量，妄图把首都变成他们反党的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在乌克兰、巴库、中亚细亚的党组织也先后粉碎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列宁周围，迎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并就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各项重大问题作了报告，起草了决议。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作了关于工会争论问题的总结。为了保证党的“十大”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强调了维护党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出：“**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30 页)鉴于反对派集团的分裂活动在事实上帮助了无产阶级的敌人，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党内不允许任何派别活动，违者清除出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各种党内处理办法，直到清除出党。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迫使党离开列宁主义路线、分裂党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列宁主义路线，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继一九一九年清党之后，进行第二次清党。根据列宁的倡议，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那些党内的“**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列宁选集》第4卷第564页）列宁还强调指出，自一九一八年初以来，混入党内的孟什维克，大约百分之九十九要清除出党。并且对个别留在党内的孟什维克都要三番五次地加以审查。清党结果，约有十七万人被开除出党，占全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通过清党，进一步增强了俄共(布)的力量。

列宁早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托洛茨基机会主义一露头，就开始反复批判和打击他的反党活动。但是，由于机会主义头子的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当他们捣乱失败后，总是装死躺下，但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一九二三年冬，国际上出现一股反革命逆流，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的革命先后失败了。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也遇到不少困难。列宁因为病情严重，不能参予领导国家大事。托洛茨基认为有机可乘，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再次向党反扑。他收罗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残渣余孽，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抛出了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和他的一封黑信，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正在“蜕化”，诅咒苏维埃国家正在“灭亡”，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活动的自由，疯狂攻击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近两年来即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同时，他们还无原则地吹捧青年学生，煽动一些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托洛茨基及其同伙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擅自把反党政纲和黑信印发到地方各支部，并且到处发表反党演说，煽风点火，公开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

面对这种情况，俄共(布)毅然决定在全党展开大辩论。在这场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进一步看清了托派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本性。全党有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党员坚决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斗争，谴责了托派分子的反党派别活动，指出他们“意在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莫斯科附近哥尔克村逝世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沉痛地哀悼列宁的逝世。

托洛茨基却利用列宁逝世的机会，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党活动。他抛出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毒草文章，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为实现其篡夺党和苏维埃政府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做反革命舆论准备。在这紧要时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挺身而出，向全党发出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号令，为继承列宁的革命事业，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伟大列宁在斗争实践中反复强调了，要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要是不这样做，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斯大林逝世后，长期隐藏在苏联党内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权力，背叛了列宁主义，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小撮叛徒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他们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他们用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抽掉，使其成为反列宁党的、反苏维埃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今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最危险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惨痛历史教训，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引自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统治的，他们定将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人民革命的洪流必将冲破修正主义的冰层，革命的红旗必将会重新在苏联大地上高高升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学说，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和平演变的教训和我国二十多年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国解放以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①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简称，一八九七年十月成立。一八九八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后，仍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主张崩得应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这一在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②博罗提巴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民族沙文主义党中组成的左翼。因在一九一八年前出版过它的中央机关报《博罗提巴》而得名。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编写者的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同志面前的一项重要学习任务。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领导苏维埃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重温列宁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是力求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向广大读者介绍列宁是怎样从各个方面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我们是在北京大学大兴县农村基地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在世界史专业教师的具体指导下写成这本小册子的。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成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大兴县庞各庄公社小庄子大队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一定会有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予以指正。